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多元调和： 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

杨 雪 著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多元调和： 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

杨 雪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 / 杨雪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308-07664-7

I. ①多… II. ①杨…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
—文学—翻译—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6942 号

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

杨 雪 著

责任编辑 张颖琪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力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25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664-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前言

近年来，有关翻译家研究的选题可谓炙手可热，国内翻译领域也相继出现一批研究成果，许多尘封已久的翻译家及其翻译作品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通过对这些译者的作品进行分析，可以形成对其翻译风格的判断；通过对译者所处的翻译情境的了解，可以知晓其翻译风格的成因，把握其翻译理念的脉络。因此，研究翻译家的翻译风格，不仅能帮助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翻译风格，提高翻译水平，而且还可使译家及译品复出并获得当下意义。

在对译者风格进行观察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很多有意思发现。例如，在忠实于原文风格的前提下，不同的译者对同一原文常常会体现出彼此互不相同的翻译风格。再如，同一译者在不同的翻译实践活动时期，翻译风格可能会大相径庭。对这样的名著名译进行研究，可以大大加深人们对翻译实践本身和影响翻译风格的各种因素的认识。以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译文读者因素为例，译文读者究竟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还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是英美高层次的读者，还是英美大众读者，都会对译者风格产生影响。一个责任心很强的译者，翻译时必然要做到 reader-based，在对原文及其文化理解透彻的同时，还要对目的语应用自如，并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有全面了解。

杨雪的这本书正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成果。作者选择了较少被人关注的张爱玲翻译作品及其译者角色为探讨对象，运用多角度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为人们展示出张爱玲的翻译实践所特有的价值和贡献。这本书是在作者三年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由于



当时类似选题只有港台的个别翻译研究者在进行研究，因此该选题不乏开拓意义，内容也具有很强的原创性。

该书在以下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研究内容方面，作者首次在中国内地对张爱玲翻译作品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翻译史中关于这位译家论述的空白。研究方法方面也有其特色，为了弥补定性分析的不足，充分说明问题，作者还进行了定量分析，对张爱玲翻译作品的海外认同度进行实证调查，即通过对当代英语本族语者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相关结论。目前在国内的文学翻译作品评价研究领域，同类调查很少见。研究范围方面，除了把张爱玲以翻译名义出版的作品纳入研究范围外，该研究还把张爱玲同一部作品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张爱玲的个案，研究作家自译这一相当独特的现象，从而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影响翻译行为的文本外因素等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范围。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张爱玲翻译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多元调和”。作者同时指出，“调和”不仅是张爱玲的美学追求，也是她的翻译追求。张爱玲在翻译中对“调和”的追求表现在各个层面和各种因素上，因此称之为“多元调和”，并将其视为杂合的理想途径。如她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对翻译主体的调和与对翻译策略的调和等。多元调和的翻译艺术使其翻译呈现出多种面貌：既有忠实于原作的译作，也有译、创结合的译作；既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又不是一味迎合；虽关注译作的跨文化流传，却不屈从于正统的文学评判标准，从而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本书对张爱玲的翻译研究是一个良好开端，希望作者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更完善的理论建构和更多样的研究方法基础上继续进行。例如，可以尝试将翻译规范理论引入讨论，或者进行文本的数据统计，以便挖掘出更多更深的层面。

冯庆华

2010年5月3日于上海

序	研读式译的中英文学名著比较·第三集
13	张爱玲与《金锁记》·王玉
27	张爱玲与《倾城之恋》·王玉
37	张爱玲与《围城》·王玉
47	张爱玲与《寒夜》·王玉
57	张爱玲与《浮城》·王玉
67	张爱玲与《半生缘》·王玉
77	张爱玲与《倾城记》·王玉
87	张爱玲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王玉
97	张爱玲与《流言》·王玉
107	张爱玲与《太太万岁》·王玉
117	张爱玲与《生死场》·王玉
127	张爱玲与《金锁记》·王玉
137	张爱玲与《倾城之恋》·王玉
147	张爱玲与《围城》·王玉
157	张爱玲与《寒夜》·王玉
167	张爱玲与《浮城》·王玉
177	张爱玲与《半生缘》·王玉
187	张爱玲与《倾城记》·王玉
197	张爱玲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王玉
207	张爱玲与《流言》·王玉
217	张爱玲与《太太万岁》·王玉
227	张爱玲与《生死场》·王玉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3
1.3 研究方法与范围	4
1.3.1 研究方法	5
1.3.2 研究范围	5
第二章 张爱玲翻译之路	7
2.1 张爱玲的创作背景与作品	7
2.2 张爱玲的翻译背景与译作	9
2.3 张爱玲翻译与创作的互动	12
2.3.1 翻译对创作的影响	12
2.3.1.1 散文翻译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12
2.3.1.2 小说翻译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16
2.3.2 创作对翻译的影响	19
2.4 张爱玲对翻译的思考	23
2.4.1 张爱玲作的译者序	24
2.4.2 张爱玲介绍译作的文章	25
2.4.3 论及翻译的张爱玲散文和信件	27
2.4.4 其他人的回忆文章	28



第三章 张爱玲与文学翻译中的多元调和	31
3.1 文学翻译的多元	31
3.1.1 宏观层次上的多元	32
3.1.1.1 文化因素	32
3.1.1.2 诗学和意识形态	33
3.1.1.3 社会、历史因素	33
3.1.2 中观层次上的多元	34
3.1.2.1 翻译性质	34
3.1.2.2 翻译主体	35
3.1.2.3 翻译目的	36
3.1.2.4 翻译原则与翻译标准	37
3.1.2.5 翻译策略	37
3.1.3 微观层次上的多元	38
3.1.3.1 翻译单位	38
3.1.3.2 翻译技巧	39
3.1.4 其他翻译理论中的“多元”	40
3.2 文学翻译与杂合	41
3.3 多元调和——杂合的理想途径	43
3.3.1 调和与杂合	43
3.3.2 张爱玲与多元调和	43
第四章 张爱玲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	46
4.1 中西译论中的翻译与创作	47
4.1.1 中国学者论翻译与创作	47
4.1.2 西方学者论翻译与创作	49
4.1.2.1 古典译学范式	49
4.1.2.2 近现代译学语言学范式	50
4.1.2.3 当代译学文化整合范式	51
4.2 张爱玲的翻译与创作	52
4.2.1 译中有作	53
4.2.1.1 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	54

4.2.1.2 翻译中的再创作	58
4.2.2 亦译亦作	62
4.2.2.1 值得关注的自译现象	62
4.2.2.2 亦译亦作的张爱玲自译	63
4.2.3 作中有译	68
第五章 张爱玲对翻译主体的调和	72
5.1 翻译主体与主体间性	72
5.2 张爱玲对译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调和	74
5.2.1 处于中心地位的读者	74
5.2.2 “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	75
5.3 张爱玲对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的调和	77
5.3.1 基于情感移注的翻译	78
5.3.2 作为对话的翻译	80
5.3.3 自译作品中译者与作者主体的调和	82
5.3.3.1 拒绝僭越的自译者	82
5.3.3.2 张爱玲自译作品中对主体的调和	83
第六章 张爱玲对翻译策略的调和	90
6.1 英译汉作品	90
6.1.1 流水句与欧化句的并用	91
6.1.2 四字格与欧化词语搭配的共存	95
6.1.3 西方韵律与东方音调的交响	100
6.2 汉译英作品	104
6.2.1 人称名称谓翻译	105
6.2.2 颜色词翻译	108
6.2.3 拟声词与元语言翻译	113
6.2.3.1 拟声词翻译	113
6.2.3.2 元语言翻译	115
6.2.4 习语翻译	120
6.2.5 意象翻译	122



第七章 当代英语读者对张爱玲译作认同度的实证调查	127
7.1 调查概况	127
7.1.1 调查目的	127
7.1.2 调查内容	128
7.1.3 问卷设计	128
7.1.4 调查对象与方法	129
7.2 数据与分析	129
7.3 调查局限	137
7.4 调查结论	138
第八章 场域对张爱玲翻译的影响	140
8.1 场域中的翻译话语	141
8.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译汉文学场	142
8.2.1 港台地区及东南亚的英译汉文学场	143
8.2.2 中国内地的英译汉文学场	146
8.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译英文学场	148
8.3.1 文学场中的汉译英作品	148
8.3.2 文学场中的张爱玲汉译英作品	151
8.4 当代汉译英文学场	153
8.4.1 张爱玲重返汉译英文学场的原因	153
8.4.2 当代汉译英文学场的状况	155
8.5 惯习的影响	156
8.5.1 个人生活轨迹	156
8.5.2 教育背景	157
8.5.3 创作风格与文学主张	158
第九章 结论	160
9.1 研究回顾	160
9.2 研究意义	161
9.3 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	162

附录	164	
附录一	张爱玲翻译年表	164
附录二	当代英语读者对张爱玲译作认同度的调查问卷	167
参考书目	180	
后记	187	



图目录

图 4-1 张爱玲翻译与创作关系示意图.....	53
图 6-1 《金锁记》首段译文意象示意图.....	124
图 7-1 48 名英语本族语者对三名译者的综合评分折线图.....	130
图 7-2 女性读者对三名译者评分的直方图.....	131
图 7-3 男性读者对三名译者评分的直方图.....	132
图 7-4 各年龄段读者对三位译者的喜好程度.....	133
图 7-5 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背景了解程度与评分的相关性.....	133

表目录

表 5-1 the fish 一词在三译本中的不同译文.....	80
表 7-1 不同性别读者对三名译者的评分.....	130
表 7-2 读者按英语优美地道程度对三位译者的排序.....	135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第一章 绪论

本章将对张爱玲的研究进行综述，包括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热点等方面。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1.1 研究背景

张爱玲(1920—1995)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与翻译，并在两种语境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初登文坛便以其独特的文风引起评论界有识之士的注意，自20世纪40年代迅雨(傅雷)、谭成璧等开张爱玲研究之先河以来，研究焦点集中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1952年张爱玲出走香港，后赴美定居，至1981年，中国内地学术界受政治、历史原因影响，对张爱玲的研究呈漠视状态，因而这段时期张爱玲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学者中展开。这一阶段张爱玲的研究者以旅美著名学者夏志清、台湾学者水晶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与揭示张爱玲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小说主题和小说艺术世界等三个方面。

1981年后，全世界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关注程度均有大幅提高。论文和研究专著日丰，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涉及的研究层面也有所突破。研究者已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转向内省、理智和成熟，在努力挖掘作品审美内核的基础上，试图建构起各自完整独立的理论观照体系。尤其在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去世后，海外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他们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读解张爱玲的作品，并在如何开拓这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纪念性文



章，对了解作者的一些隐秘心态及鲜为人知的创作心理实录，对后人了解张氏真实人性的一面有很大的帮助。主要论者包括美国的李欧梵、王德威、司马新等。林幸谦 2000 年出版的《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重读张爱玲》、苏伟贞 2002 年出版的《孤岛张爱玲》、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蔡登山《传奇未完：张爱玲》等也是近年有关张爱玲研究的力作。此外，在日本学术界，张爱玲也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重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起，中国内地学者也形成了张爱玲研究热，发表了多本张爱玲传记，发掘其早期的佚文，出版了多套张爱玲文集，各种专著层出不穷，影响较大的包括柯灵、陈子善、余斌、金宏达、邵迎建等人的文章或著作。2007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张爱玲”为题名可搜索到 1197 篇论文；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还可搜索到 50 篇题名中含有“张爱玲”三字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另有统计显示：2003 年中国国内发表的研究现代作家的学术论文，研究最多的是鲁迅，其次是胡适，第三就是张爱玲。^①

在张爱玲研究的大潮中，对张爱玲翻译作品的专题研究少得可怜。在上面提到的国内论文中，仅有 2003 年的一篇论文、2003 和 2005 年的两篇硕士论文专文论述张爱玲的翻译。硕士论文分别以《译家张爱玲及其小说的翻译》和《张爱玲小说〈金锁记〉英译本研究》为题，前者论及张爱玲创造性写作、重写与翻译及杂合与翻译的问题，后者重点分析张爱玲在翻译中对《金锁记》中一些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处理。两文均未涉及张爱玲的汉译作品研究，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2007 年前，专文论述张爱玲翻译的博士论文尚未见到。学术专著中论及张爱玲翻译的仅见 2005 年孟昭毅和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其中“港台的翻译文学”专辟一节“受冷落的译者张爱玲”，介绍了张爱玲的翻译经历和翻译作品的概况。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学者较早关注到张爱玲的翻译作品。1982 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译丛》(Renditions)出了一期通俗小说专刊，刊登了张爱玲英译的《海上花列传》前两章，译笔婉切自然，颇合源语神韵。近年对张爱玲的翻译关注较多的还有香港著名学者刘绍铭，他曾在香港出版的文

^① 2005 年 9 月 8 日，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与网友共话“张爱玲与《沉香》”时谈到这个统计结果，见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2496/42500/3679798.html>。

学杂志上撰文讨论张爱玲的中英互译，后来又将该文收入他 2006 年在香港出版的《文字的再生》一书，但是，由于此书暂时未进入国内图书馆和市场，这一研究成果还未得到广泛传播。

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在现阶段鲜见对张爱玲翻译的系统研究。陈子善 1998 年在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的文章中指出“对张爱玲翻译成就的介绍比较薄弱”，其后又于 2003 年在《文汇报·笔会》中呼吁关注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及初版本译序。刘维荣(2000: 76)认为：“对于张氏所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翻译工作方面的研究缺乏观照，一方面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传奇》中每篇小说之汗牛充栋的长篇论文连篇累牍，另一方面却是对这位大家其他卓越成就的漠然无视。”2005 年刘绍铭也提醒大家加强对张爱玲翻译作品的研究。^① 这些情况促使笔者将“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作为选题，尝试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对张爱玲的翻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分析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2. 通过张爱玲的个案，研究作家自译这一相当独特的现象，从而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等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3. 通过对张爱玲的译文和对照译文进行海外认同度调查，探索现阶段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期待视野和易为读者接受的翻译方法，预测什么样的翻译规范比较容易在目前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以便为汉语作品输出提供借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

1. 张爱玲的个案可以为中国翻译史的编写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2. 通过译文分析和调查海外读者对译文的评价，可以为文学翻译提供可

^① 2005 年 12 月 2 日，刘绍铭在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从译文的角度对张爱玲进行分析，见华东师范大学新闻办“张爱玲研究尚存许多空白”一文(http://www.ecnunews.ecnu.edu.cn/xwzx/script/three_mtsd.asp?id=55105)。



资借鉴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3. 有助于深化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译者身份的嬗变、译者主体性、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等方面的认识。
4. 对张爱玲的翻译研究也给张爱玲整体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素材。

1.3 研究方法与范围

20世纪50年代国际译联成立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不仅注意到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目的性，还注意到译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随着80年代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又增添了新的维度，如翻译研究学派认为翻译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制定规范，不在于判断译文和源文是否对等，而在于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守的规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更加凸显出来。

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近年对翻译的学术研究也蓬勃发展，但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仍有一些有待深入之处，例如，讨论的重点长期集中在翻译的性质、标准、技巧等方面，而对翻译的主体——译者缺乏系统研究。有学者指出，这方面已有的研究也大多是对翻译家翻译观和翻译活动的介绍，未深入探讨翻译家的文化思想、审美意识及对译入语文化的意义等。然而，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影响都是通过译者来体现的，译者的选择、翻译的方式、翻译的策略等，反过来又折射出特定时代社会文化语境。要深入探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穆雷，诗怡，2003：12）。

由以上论述可见，在对中国翻译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其译作的语言进行研究，更要对语言以外的诸因素，如文化差异、读者接受、翻译目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场域等，进行描述性研究。如此，一方面，加深我们对翻译本质及翻译与文本内外诸因素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翻译现象，还能真正对将来的翻译实践有所启发，使制造出来的译文起到预期作用，加强翻译的社会功能。因此，本书力图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并拓宽研究范围。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范

围如下所述。

1.3.1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分析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

1. 对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进行描述和理论分析；
2. 对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及作品作比较全面细致的整理和总结；
3. 对选取的例证进行分析来形成对译作特点的认识；
4. 借助相关理论，对译作特点的成因和译作接受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为了弥补定性分析的不足，充分说明问题，我们还进行定量分析，对张爱玲翻译作品的海外认同度进行实证调查，通过在当代英语本族语者中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目前在国内的文学翻译作品评价研究领域，同类调查极少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个人能力、调查的试验性和可操作性所限，本项研究在定量分析的过程中仍有一些局限，如调查内容选取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调查规模和范围等。

总体而言，本项研究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将研究各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看待，避免价值判断，对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和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整理和分析，从而在译者研究、翻译批评的描述性研究方面迈出有意义的一步。

1.3.2 研究范围

香港学者张南锋曾指出中国翻译研究的问题之一是：范围不宽。具体地说，首先涉及翻译的定义。传统的观点认为，达不到某个程度的忠实，就不算翻译，至于改译、编译，就更不用说了。其次，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只研究文本，不关心文本以外的因素。再次，中国翻译研究过于强调实用性（张南锋，2004：15）。

为了克服以上局限，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本书首先把张爱玲的英译汉美国文学作品和汉译英作品纳入研究范围，前者包括《老人与海》、《睡谷传说》、《爱默森选集》、《美国诗选》等，后者包括 *The Golden Cangue, Shame, Amah!* 以及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的第一、二章。



本研究还把张爱玲同一部创作小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纳入研究范围。“version”一词在《翻译研究词典》中有详细解释，即“改本或改译”，后者是勒菲弗尔(Lefevere)采用的术语，指被他称为解释(interpretation)的这种翻译策略下的两种子类型之一，另一子类型为拟译，但与拟译者不同的是，改译者虽然对作品的表现形式作了很大改动，但对文本的解释与源作者基本相同。(Shuttleworth & Cowie, 1997)。对于张爱玲而言，情况就更特殊了，因为中文版和英文版的作者都是她自己。根据波波维奇(Popovic)对自译的定义：“由作者本人将原作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同上：265—266)，以及张爱玲的友人对她写作状态的描述“可以先写中文，然后自译为英文；也可以先写英文，然后自译为中文”(金宏达，2003：241)，我们有理由把张爱玲的《怨女》、《秧歌》、《五四遗事》都作为张爱玲的自译作品纳入研究范畴。

此外，张爱玲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风格及成因、译作的接受状况、读者评价、社会历史语境等方面的情况都属于本研究范围。

限于篇幅，本次研究暂不对张爱玲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节译本和电影、广播剧改编本进行讨论。